

Lingnan University

##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

---

Volume 1

現代中文文學評論 Review of Modern Literature  
in Chinese

---

6-1994

### 翻譯文學的發明功用 The Elucidating Function of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

Shiu Ming, Joseph LAU  
joseflau@ln.edu.hk

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: [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rmlc\\_1](https://commons.ln.edu.hk/rmlc_1)



Part of the [Chinese Studies Commons](#)

---

#### Recommended Citation

劉紹銘 (1994)。翻譯文學的發明功用。《現代中文文學評論》，1，147-152。檢自  
[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rmlc\\_1/12](http://commons.ln.edu.hk/rmlc_1/12)

This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 現代中文文學評論 Review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at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in Volume 1 by an authorized administrator of Digital Commons @ Lingnan University.

# 翻譯文學的發明功用

劉紹銘

## I

在大學開中國文學的課，如果學生是中國同學，老師遴選教材，範圍海闊天空。繁體簡體、直排橫排，任君選擇。但如果此課係用英文或其他外國語言講授，用的又是翻譯教材，那老師所遇到的各種技術困難，非過來人難道其詳。

我在美國教中國文學，轉眼已近三十年。研究院的課，教材沒有問題，因為碩士、博士班的研究生，理應有能力閱讀原文著作。最令一般老師困擾的，是在大學部開的英譯中國文學導引之類的入門課。

所謂“技術困難”，大致言之不外是：選些甚麼作品作教材？選上的作品有無英譯？譯筆是否可靠？一家的作品，譬如李白和杜甫的詩，有多種翻譯時，該選哪一家的較為適當？

比起前輩來，今天的老師運氣多了。二、三十年前老師要學生讀《西遊記》，除了韋理（Arthur Waley）的節譯本 *Monkey*，再別無選擇。今天傳統小說的經典著作，如《三國演義》、《水滸傳》、《金瓶梅》和《紅樓夢》等，都有不同的譯本供老師參考選用。

英文翻譯缺乏，教材無選擇餘地，老師也成了被動，應教學生些甚麼已談不上，有甚麼現成的就教些甚麼吧。如果老師無言志的興趣，抱着“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”的心理，那麼教這門課的壓力不大。英譯中國文學越是荒涼，選擇教材越輕鬆，因為別無選擇。

翻譯的教材供應無缺，要從中國文學作品取那些作樣本傳授外國學生，確也費煞思量。

朱東潤主編的《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》，先秦部分繼《詩經》後，就選了《尚書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和《戰國策》等散篇，歸入歷史散文類。

朱東潤這套《作品選》，對象是唸中文系的本國學生。舊時國人讀書，文史哲不分，因此先秦散文的類型，除如上述，還收了諸子各家代表。這麼一個安排，很合情理。一來讀書豈能無史，二來即以文學眼光看，《左傳》和《戰國策》有不少章目，敘事紀人，別具匠心，對後世散文和小說的發展極有影響。

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和《莊子》等各家，收為諸子散文之範本，想是側重其思想。讀王維、杜甫而不知有孔孟老莊，猶如未受新舊約《聖經》洗禮的人，難識《神曲》或《失樂園》微之大義。

這些都是編輯人應有的認識。《作品選》先秦部分最後一個項目是古代神話。這也是個重要的一欄，因為《山海經》這類典籍，在中國傳統文學的地位相當於希臘神話於西方文學。朱東潤在這些方面，可說顧慮周詳。

現在我們要正面接觸到講授英譯中國文學的各種技術困難了。上面說過，需要通過翻譯來閱讀中國文學的，是大學部的學生，十之八九主修醫理商工農。他們選修這門課，各有各說，但為了滿足人文學分之需要，卻是主因。

假使《作品選》全部篇目都有英譯，可不可以因利乘便就以此書作教本呢？當然可以，如果這是全校的大學生不修這一科就不能畢業的話。

這門既是選修科，學生如果覺得內容枯燥，說不定就會退選了。學生退選，並不表示老師不稱職、或教材不合適。學校行政人員，對此也不過問。他們斤斤計較的，是選課的學生人數多寡。在某些美國公立大學，一門課的學生若低於某個“法定”數字，譬如說五位吧，院方就會明令取消，請老師另開一些“較受歡迎”的課。

一門課要受學生“歡迎”，老師是否有“化枯朽為神奇”的本領，固然是不可或缺的因素。《尚書》未有英譯，不過，像“周公曰：烏虘！君子，所其無逸”這類散文，譯成英文，老師再三頭六臂，想也難引學生入勝。這短短十一個字，朱東潤就落了差不多四行的註釋。

由此可見，用翻譯跟“不知有漢”的學生講授中國文學，《作品選》編排雖善，卻不能不出於因人、因時、因地制宜的考慮，作必要的修正。這範圍牽涉至廣，我只能點到為止。其餘觸類旁通。

## II

1965年，白之（Cyril Birch）教授編譯《中國文學選》（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）上册在美出版，所收作品年代到元曲為止。先秦部分，《詩經》後就是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、《戰國策》、賈誼〈過秦論〉、《楚辭》代表作如〈離騷〉、〈九歌〉等。再下來就是《莊子》。

拿白之的先秦部分與朱東潤的相比，差別顯而易見。後者諸子散文，有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墨子》、《莊子》、《韓非子》，和《呂氏春秋》。

白之只選了《莊子》。其餘各家無關宏旨？在討論這問題之前，我們先得明白，編選一部英譯中國文學選集，會受到以下各種限制。第一，出版社給編者多少篇幅？（白之的選集上册，合492頁。）要收的作品，有沒有現成翻譯？水準如何？

除此以外，還要考慮到轉載的版權問題。有些出版社授權轉載，收的費用僅屬象徵性。有的卻似天文數字。這也是說，編稿人覺得非選不可的翻譯，有時卻因付不起轉載的版權費而割愛。

朱東潤編《作品選》時，一定會碰到若干限制和約束，但性質絕不會與此相同。

那麼，白之先秦諸子中獨尊莊子一家，說得過去麼？他會不會因為遇到上述的一些困難而捨棄孔孟呢？這一點，我們既不知情，不便瞎猜。至於說不說得過去這問題，如果避重就輕的回答，那簡單不過。在反越戰風起雲湧的60年代，美國大學生看得下去的中國“哲學”，非釋即道。儒家強調“雖千萬人吾往矣”的贖世精神，與當時的“大氣候”格格不入。

如果白之“尊道輕儒”，是出於對人、地、時客觀條件的考慮，用時髦話說，這是與P C有關的用心。P C是Political Correctness的縮寫，意謂政治正確性，特別重視配合現實。為了解釋P C，請容我打個岔。

1993年秋季號的《宗派評論》（Partisan Review），是個討論美國P C的特刊。其中史多爾斯基（David Sidorsky）寫的“多元文化與大學的關係”（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University），對我們正討論的題目，尤有參考價值。史多爾斯基指出，今天奉行P C的文科老師，課本要挑選得“正確”不待言，更因文學作品可有多種不同的看法，他們事先還得弄清楚，自己將要採取的，是甚麼一種立場。這是說，怎麼教和教些甚麼，同樣重要。

以所謂第三世界或女性主義的觀點看，西方文學公認的大宗師，因多是歐裔的大男人，從荷馬數起，都帶着原罪。蕭伯納對莎士比亞就有微詞，說他是工業社會海盜行爲的代言人。但以文學的眼光看，莎劇的經典地位，無可取代，不能從闕。

莎翁揮之不去，要實踐P C精神，只好從教學方法入手。據史多爾斯基的報導，美國南部一大學的英文系系主任，就這麼公開說過：今天要教莎劇，只能從種族、階級、和性別的立場入手。換句話說，以此爲“批判”理論基礎。

P C的認識對大學課程編排的影響，由來已久。中世紀時代的學院，讀物多與神學和哲學有關，文學不是拉丁文就是希臘文。歐洲學院之“世俗化”，是文藝復興時代才開始。所謂世俗化，就是容許異教文獻和用現代語言寫成的作品納入學院課程之內。

有關美國的P C風潮，不是三言兩語說得清楚，不過上面短短的介紹，已提供了我們繼續討論編譯中國文學選集觸類旁通的資料。

### III

現在我們舊話重提：“白之先秦諸子中獨尊莊子一家，說得過去麼？”

我們記得，他選集的對象是“不知有漢”的大學生。因此我們可以這麼下判斷：說不過去，但可以了解。如果對象是研究生，那當作別論。理由已在上面交待過，不再重複。

P C其實也是一種反映當時趣味和價值觀念的一種修正主義。寒山的詩，大概不入中國文學的“正統”，所以朱東潤沒有收他。白之卻以九頁的篇幅刊載他的詩和閻丘胤的序文。譯者是 Gary Snyder。嬉皮詩人譯嬉皮和尚給嬉皮學生看，三位一體，確是難得一時之選。

白之選集，是60年代的產品。迄今爲止這還是此類選集唯一的一本。自1985年開始，我和閔福德（John Minford）教授斷斷續續的編譯了篇幅要比白之多好幾倍的傳統文學選集。此事已做得七七八八，如無意外，應在兩年內由中文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兩出版社分上下冊出版。

因爲所收歷朝作家作品數字太多，無法在此作流水賬的介紹。可簡言之的是，這也是爲英美大學生而設的讀本，不過除老莊外，目中還有孔孟就是。

我們的編輯工作，比白之前前後後晚了差不多三十年，在選材方面，比他佔盡了便宜。熱門的作品，如李、杜的詩篇，因為多了別家翻譯，在選材取捨方面，大有轉圜餘地，不像他從前那麼被動。

更值得我們慶幸的是，這十多年來，許多以前認為“冷門”的詩人，也先後出現了英譯。假設三十年前，白之有意突出P C，除李清照外，他還想到要把薛濤和魚玄機收進去，只可惜這兩位唐代女詩人的作品，當時尚未有英譯面世。白之或自己動手翻譯，或迫得割愛。

我們該明白的是，三十多年前，英譯中國文學，百廢待舉。除了薛、魚等女詩人詩作得向歷史取公道外，還有其他當務之急。白方如要面面兼顧，他的選集恐怕到今天還出不來。

這正是閔福德和我編的集子，在選材上佔便宜的地方。薛濤和魚玄機遺稿不多，鑑於中國婦女在舊社會識文墨的機會不多，她們的作品尤見難能可貴。

我們把薛濤和魚玄機收進集子，是不是出於P C的考慮？當然是，而且是應該的。女人是半邊天，文學史上兩性作品的數量出現如此偏差，是幾千年來中國社會“女子無才便是德”偏見做成的惡果。往日之過不可補，來者猶可追。

以P C觀點看，像劉向《列女傳》這類的傳記，有沒有收入文學選集的價值？我看這得視編者的取向而定。教材內容有所謂正面反面。《列女傳》是我們早期傳記文學之胚胎，因此是傳記文學的一個類型，單以這一點作論據，那一位編輯要收入選集，也言之成理。

至於《列女傳》的內容或意識形態，那更不足為慮。一來在選集出現的作品，並不代表編輯個人對其道德境界之認可。二來此書所鼓吹的“三從四德”封建思想，對新一代的讀者說來，直怪誕得如天方夜譚。他們看了，絕不會走火入魔，效法古人。反過來說，《列女傳》倒是引導今人“憶苦思甜”的上好素材。

本文以有限之篇幅，簡說英譯中國文學教學與編選課本各種技術困難。文內爲了方便說明教材得跟上時代脈搏，特別借用了在美國流行一時的P C觀念。如果P C可粗分惡性良性二類，前者偏激狹窄，不能容物，後者瞻前顧後，損有餘以補不足，那麼良性的P C堪作“修正主義”之別名。

正因英譯中國文學選集的對象是英美大學生，編稿人走修正主義路子，勢不能免。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除了上述我和閔福德所編的那本選集外，年內還有一個集

子要出版。書的目錄在出版前是“商業秘密”。詳情即使是審稿人也不應透露。風聞這是一本相當不入流俗的選集。不入流俗可有不同的解釋。最極端者莫如離經叛道，人棄我取。如果這選集錄用了《肉蒲團》或《綉榻外史》這種令中國正統文史家側目的著作，這是不入流俗一例。

白之突出寒山、我和閔福德追認薛濤和魚玄機的价值，也是不入流俗的一種用心。

不入流俗乍看是與時髦的P C精神認同，但實際上涉及文學的定義問題。通俗文學如山歌艷詞今天已取得其理論地位，但“俗”如《肉蒲團》者，是否可入中文版大學教科書的廟堂？我看這個問題，對不用翻譯講授中國文學的老師而言，一時難有定案。

由此可見，同是中國文學，因傳授的對象與所用的語言不同，會產生不同的定義與解釋。從集思廣益的觀點看，這是好事。西方漢學家雖以中國文學為職志，但出身的文化背景與國人畢竟不同，對文學的要求與看法，也說不定因此有異。

他山之石，用以互相發明，可補國人因墨守繩規而做成的遺珠之憾。這裏且舉一現代文學實例，以結束本文。張愛玲小說的造詣，在台灣和香港早有定論，但她受到大陸文壇的注意，是近年的事。蘇童和須蘭這兩位年青作家，也坦承受到她的影響。

如果夏志清在1961年出版的《中國現代小說史》不特闢篇幅討論她的成就、不在他編的選集收她的《金鎖記》，張愛玲今天不會有此地位。

夏志清教授不是“洋人”，但他英文系出身，訓練和價值觀自會受到西方文學的薰陶。張愛玲也是英文系出身，文學的感性與趣味自成天地。她作品之為見解不入流俗的夏志清賞識，因此不是偶然的事。

此文以“互相發明”為題，正是此意。寒山、薛濤和魚玄機，會不會因西方漢學界給他們“不入流俗”的待遇，而在中國文學史得到重新定位，這只好看未來的發展了。

作者任職於威斯康辛大學東亞學系。